

林家次女

林太乙 著



學林出版社

林家次女

林太乙著



學林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林家次女 / 林太乙著. — 上海: 学林出版社, 2001.6

ISBN 7-80668-063-2

I. 林... II. 林... III. 林太乙—自传

IV. K825.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1)第 23945 号

林家次女



作 者——林太乙

责任编辑——乐惟清

封面设计——早早工作室

出 版——学林出版社(上海钦州南路 81 号)

电话:64515005 传真:64515005

发 行——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

学林图书发行部(文庙路 120 号)

电话:63779027 传真:63768540

照 排——学林出版社照排中心(文庙路 120 号)

刷——上海港东印刷厂

开 本——850×1168 1/32

印 张——7.25

字 数——125 千

版 次——2001 年 6 月第 1 版

2001 年 9 月第 3 次印刷

印 数——8,001—11,000 册

书 号——ISBN 7-80668-063-2/I·17

电子信箱——xuelinph @ online.sh.cn

定 价——14.00 元

序

我在这本书里描述我充满快乐,又好玩又好笑的童年和成长的过程,以及父亲给予我的不平凡的教育。

我不平凡的教育小时候在上海开始。父亲倜傥不群,对什么都有创见。他认为,整个世界就是大学堂,在学校里能学到的东西不如从校外所见所闻能得到的知识;只要养成爱读书的习惯,一部字典在手,凭自修,什么学问都能学到。

我小学还没有毕业就随家人去了美国。那是在 20 世纪 30 年代,中国多年来饱受外国欺侮,而在美国有排华法案,美国人严重歧视中国人。父亲对我们小孩子说:“你们在外国不要忘记自己是中国人。外国人的文化与我们不同。你可以学他们的长处,但绝对不要因为他们笑你与他们不同,而觉得自卑,因为我们的文化比他们的悠久而优美。无论如何,看见外国人不要怕,有话直说,这样他们才会看得起你。”

父亲认为我们什么都应该见识见识。在上海时他带

我们去馆子叫条子,在家里欣赏西洋音乐,也去杭州游西湖。在美国我们饱受文化震撼,无论在哪一方面,美国人都与我们不同。父亲教我们如何适应。恶补英文之后,我入美国小学,但在只差几个月就可以毕业时又随家人去了欧洲。我们探火山口,参观教堂,看脱衣舞;我入校恶补法文,但没多久又到美国入中学。一年之后回国,在内地饱受日本空袭的惊吓。到美国之后,又不得不努力自修才赶上了学校里的课程。

在那些年里,父亲无时不在教我学习中文和了解中国文化,而母亲则依她在厦门鼓浪屿娘家的家教教导我们,因此我们虽然在外国长大,却仍是不折不扣的中国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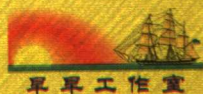
中学毕业之后,我不平凡的父亲竟然不要我上大学!他要我踏入社会做事,念“文学所取材的人生”。天下事无奇不有,我在十八岁时,竟然去耶鲁大学教中文。抗战胜利之后,我回到上海,但那已经不是我记忆中的上海。1995年我又回去过一次,那更不是我小时的上海。美国小说家沃尔夫说,故乡是不能再回去的,意思说,假如回去,会发现那里已经人事、景物全非了。换句话说,童年是再也找不到的。我只有在记忆中能回到我的童年和少年,所以我把它写出来,看看是否曾真有其事。

林太乙

1996年于华府



父亲林语堂说：
社会是个大学堂，
根本不必读大学。



林语堂认为，手持一部字典走天下，什么知识都有了，任何学问都可以自修。女儿中学毕业后，林语堂却认为，她没有什么必要上大学了，而是领着她尽快地溶入社会。后来，女儿竟成为耶鲁大学中文教授，任美国《读者文摘》中文版总编辑；将《镜花缘》译成英文，在美国出版。



目 录

序	1
移植上海的厦门人	1
母亲只会生女儿	8
戇团仔	17
家里的事不要让别人知道	23
我是不是白痴?	33
两种不同的人	40
耳濡目染	47
肚皮上有一条蜈蚣	56
我们要去美国!	65
突然觉得自己是中国人	72
文化震撼	80
《课儿小记》	91

欧洲之旅	98
局外人	113
可怕的月光	120
轰炸季刚开始	128
“林太太！林太太！升红旗了！”	134
在缙云山上	143
我们中头奖啦！	149
好像在做梦	157
这无非在所逆料	163
上委员长外交方策意见书	168
移植美国的中国人	176
父亲不要我上大学	183
读书的艺术	191
荣誉毕业生	200
在耶鲁大学教中文	207
故乡不能再回去	210
春日在怀	218

移植上海的厦门人

小时候,在 20 世纪 30 年代,我们住在上海。我以为只有我们一家人和我们的亲戚讲厦门话,因为周围的人都讲别种话。我们住的弄堂在静安寺附近,叫柳迎村,一排排两层楼的房层建造得很密。母亲会从楼上的窗子俯身探视住在对面的“广东仔”打麻将,嫌他们的留声机开得太大声,放出的“广东仔”戏真难听。隔壁住的是“福州仔”,“福州仔”做的肉松和厦门人做的不同,母亲不爱吃,“仔”字有几分蔑视别人的涵义。我们是厦门人。的确,除了厦门人之外,母亲对别地方的人都存有疑心。

其实,父亲是在平和县坂仔村出世的,但是我们却认为我们是厦门人,因为母亲是厦门人。她给我的印象是,唯有厦门人才靠得住,而最靠得住的莫如住在厦门对面鼓浪屿漳州路一百二十号(现在改为四十四号)的花园洋房里的人。那是外公廖悦发的家,是母亲一切智慧的



外公廖悦发和外婆林氏。

小时候，母亲给我的印象是，唯有厦门人才靠得住，而最靠得住的莫如住在厦门对面鼓浪屿漳州路的花园洋房里的人，那是外公的家，是母亲一切智慧的源泉。

源泉。

外曾祖父廖宗文年轻时在厦门开小店子，卖餐具和厨房用品。他有四个儿子，我外公排行第二。他怎样变成富商的我不知道，却知道他的兄弟早就和南洋有生意来往。他创办豫丰钱庄，拥有房地产，在厦门有自己的码头和仓库。廖家的人骄傲地说：“鼓浪屿廖家谁都知道，你写信的时候不必写地址，只写廖宅就可以了。”

鼓浪屿是公共租界。当年清政府被迫与英国侵略者签订《中英南京条约》，辟厦门等五埠为通商口岸，但在条约上无所谓租界，到光绪十八年才由当地宦吏与英美德

法日等七国领事签约,辟鼓浪屿为公共租界。各国领事乃设立工部局及会审公廨,办理地方行政和司法事宜,而大权实操于英国领事手里。

鼓浪屿矗立海中,风景清幽,龙头山与厦门的虎头山相对,有龙虎守港之称。厦门是天然海港,各国船舰沿岸而驶。在 20 世纪 30 年代更填筑堤岸,长凡三里,造大码头,并开辟鹭江道,其热闹与上海的黄浦滩无殊。那是外国人威风凛凛的地方,外国商人坐在轿子上会随便踢轿夫或拿棍子打路边的孩子。但这些番仔也带来耶稣教,设立许多教会学校。母亲少年时就在毓德女校读书,而父亲在寻源学校就读。

我从小就听说鼓浪屿沙滩的沙有多细多白,山上的洋房多漂亮,街道多么清洁。岛上居民只有几千,没有车马,走在山上小道可以听到从洋房里传来的贝多芬或肖邦的钢琴曲,或从教堂里传来的《圣母颂》。

外公的花园洋房就在绿荫处处的山上。花园里有盆栽,有棵高及二楼阳台的玉兰树,蝴蝶在绿叶中飞舞。还有酒坛,装着廖家自酿的黄酒。廖家男人从外面回来,会揭起盖子顺手舀起一瓢来喝。走上宽大的石阶便是走廊,石阶后面是大厨房。大厅方方正正,后面是外公外婆的卧房。外公有三男三女,大舅三舅根本没有好好地读过书,也不帮外公做生意,只会花钱抽烟喝酒找女人。二舅倒去过美国学医,后来在厦门大学教书。廖家对女儿

却管教得很严,认为女儿要会烧饭、洗衣服、缝纫、打扫房屋,样样都要照规矩学,将来才能嫁到好人家。外公是家中暴君,动不动就对家里的女人发脾气。在楼上住的是大舅三舅两房,洋房后面还有个比较小的房屋,里面住三叔公和他从南洋带回来的马来婆和他们的孩子。那马来婆把家里弄得又臭又脏,是外公常发脾气的一个原因。母亲提到外公时,总说:“我老爸真恶,脾气很坏,很会骂人。”从照片看来,外公的面容的确威严。

外婆娘家姓林,长得很俏,皮肤白皙,大眼睛,尖鼻子,薄薄的嘴唇。她天性温顺,被外公欺侮时她一声不响。她生的三个女儿都长得像她,而且头发带点黄色,甚至两颊上有雀斑。母亲会指着外婆的尖鼻子当笑话说:“我们有犹太种!”论脾气,母亲却没有外婆那么温顺。哥哥骂她,她会顶嘴,绝不让人欺侮。

然而在那男女不平等的社会,女人自有女人的天地、女人的办法。女人是一党,男人是一党。珠宝是女人的私藏,外婆有许多首饰,金的银的,钻石、玉器、珍珠。母亲出嫁时(嫁给坂仔那穷牧师的儿子,呷饭的人家嫁给呷糜的人家),外婆就给了她许多首饰。父母亲在外国留学时钱不够用,不得不变卖首饰以维持生计。

女人逍遥自在的地方是厨房,那是男人从来不去的。但在厨房里也有复杂的阶级组织,一个女人凭她在家里的地位、年龄、丈夫有没有出息,决定讲话大声、小声或索



性不出声。

母亲少年时最愉快的记忆就是在大厨房里,在外婆监视下和姑嫂姐妹们一起做肉松。家里人多,过年过节时还要送礼,一做起肉松来就要买几十斤猪腿肉,大家忙得团团转,切肉的切肉,在大灶上熬猪油的熬猪油,边做边聊天,笑声连连。“隔壁的阿发嫂一连生了六个女儿,去烧香求佛给她生个儿子,上个礼拜又生了个女的!”“哈?又生了个查某个?”大家惊叫,虽然大家已经知道这消息。“是的,又生了查某个,第七个了!”大家格格地笑。“胡家的媳妇不肯为全家人洗衣服,爬到树上蹲着不肯下来,直到天黑,她公公答应找个丫头来帮忙,她才从树上跳下来。”大家又笑了一阵。“那次从金门来住几天的表嫂,我们一起做针线,”谁又说,“表嫂的鞋面倒绣得真水(美),但是翻过来一看,失德喔!针线胡邈邈!线打结之后都拖个尾巴!”大家又笑了。一面做活一面聊天,大家的眼睛却很尖锐,什么都看在眼里。谁剔猪肉筋剔得不够干净,谁切猪肉切得不够细,都被人看见。“阿珠啊,你的猪肉切得这么太块,是要喂狗吗?”有地位的姨母会问年轻的外甥女。阿珠脸一红,低下头来把肉切细了。有的女人可以当面指摘,有的需在背后批评,就这样,年轻的一辈从长辈的谈吐举措中,学会烧饭、做针线和做人的道理。

肉松不容易做,考验女人的细心、耐心和技巧。猪腿

肉去皮去筋切成小块之后,要放入水里氽一下,拔去血水。在大灶上的大锅里烧热猪油,加红糟、黄酒、白糖略炒之后便可以放下猪肉,炒透之后加清汤,用文火慢慢地烧,烧到肉变成浆糊状,继续用极小的火慢慢地炒,炒到汤汁完全收干,猪肉起泡发松,便可以起锅。门门是学问,如果炒得太久,肉炒焦了会发苦味。炒得不够干,吃起来就不够松脆。廖家的肉松又香又脆,是极品,亲友们尝了都赞口不绝。肉松冷却之后装在铁皮饼干盒里,储存多久都不会坏。

母亲移植在上海,周围都是他乡人,她不相信他们,样样要厦门的才好。她好像在异域建立厦门基地。我们在家里当然讲厦门话,女仆是从厦门带来的。论吃的,没有什么比得上厦门的海鲜、蒸鲟、蚵仔煎、加腊鱼煮面等等,在上海不容易吃到,母亲想起来就流口水。从厦门到上海要乘三天的轮船,是件大事。亲戚从厦门来,总带许多吃的东西给我们,常有凸柑、龙眼干、铁观音茶、扁鱼干、虎苔和外婆囑家里的女人做的肉松。母亲收到了,好像回到娘家一样高兴。她把肉松像宝贝似地收起来,偶尔才挑几茶匙出来让我们拌稀饭吃。亲戚自然也带来许多家里的消息,这些消息虽然大多数母亲已经知道,因为她和家人经常通信(是用罗马拼音的“白话文”写的,这是在基督教办的毓德女校学到的),但是她还是好像第一次听见,不时“啊唷、啊唷”地叫。



后来大舅的女儿桐琴舜琴到上海中西女塾读书,我们收到的肉松增加一倍,是大姆托人带来的。肉松弥补学校里的伙食,也减轻桐姐舜姐的思乡之情。这对姐妹长得像两朵玫瑰花,却不善适应上海的环境,上海话也讲得不好。她们一回来就和我母亲重温厦门的事,一遍又一遍,好像从这些信息吸收滋养。报告学校里的情形时,她们会加几句上海片语,但是只有讲厦门话时才活泼起来,如鱼得水,如沐春风。

这也是为什么小时候我以为只有我们一家人和我们的亲戚讲厦门话,我以为这是我们的特征,像家里许多方面一样,与众不同。

母亲只会生女儿

从小,我就知道有鼓浪屿这个地方,好像我未出世前就在那里,好像我是从那里来的。也许是因为我出世不到一个月母亲便抱我回去那里。但对那时我没有什么记忆,一切是听母亲说的。

我是1926年在北京出世的。早一年的3月,国父中山先生逝世,5月发生五卅惨案,7月国民政府成立。就在我出世的4月,北京临时政府下台。那时,父亲在北京大学执教,兼任女子师范大学英文系教授和教务主任,并且常写文章在《语丝》上发表,批评政府。

我出世,母亲一定很失望,因为她又生了个女儿,不过,这次生产很顺利,不像生姐姐那样难产,险些儿送掉母女俩的生命。姐姐是在外公家里生的,幸亏有二舅,他是西医,救活了她们。我是在北京协和医院出世的,这家医院母亲叫做 PUMC,过了许多年之后,我才知道那是